



在沱江书院原址兴建的华容一中。

千年学府探文明
走读湖湘书院

简介

沱江书院地处岳阳市华容县,其前身是龙峰书院。龙峰书院在华容县圆觉寺旁,光绪二十三年(1897),知县刘朝焜将其迁至黄湖山南麓,乾隆二十五年(1760),知县狄兰标在县署东辟地创修,易名。后倾圮,1996年原址重新修复。

蔡勋建

暮秋初冬,暖阳和煦,我与两位老文友相约造访沱江书院。文友诧异:怎么忽然想到要去看沱江书院?我笑说:“重温学梦,汲取力量。”是的,那里曾是学子渊薮、承传文化根脉的地方。

穿过华容一中校园,行至黄湖山南麓,便见沱江书院。书院古朴,却乏雄伟,这是古书院的复制品,也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沱江书院的前身龙峰书院在华容县圆觉寺旁。清光绪《华容县志》载寥寥数语:“沱江书院:县治东旧有龙峰书院,乾隆初督学李侍御题额,以邑东有龙峰山,故名。乾隆二十五年知县狄兰标辟地创修,易名。”

创建沱江书院,华容县令狄兰标是个关键人物。狄兰标,字雨苍,江苏溧阳人,举人出身。狄氏任前,华容无官办书院,他道义在肩,“以兴起学校为首要务”,上任伊始便要创办书院。可这谈何容易,筹措资金困难,建筑材料匮乏。说来也巧,就在他辟地擘画之际,这年夏天,长江流域发大水,作为长江支流的沱江(一名华容河)自然是洪流滚滚。忽一日,一根巨大的楠木从上游漂流而至,大小正好作栋梁之材,而且两头有榫。乡党言之凿凿,是“天顾神助”帮了狄知县的大忙。

乾隆二十五年(1760)书院于县署东破土动工,经年即竣工。书院既成,县人喜之不胜,狄兰标更是倍感欣慰,乘兴运毫写下《新建沱江书院记》。狄公豪目如炬,写道:“远分鹿洞之条,近可参岳麓之讲,为名臣,为鼎元,腾梓里之光,为子臣之鹤相继而起。”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都曾是理学家朱熹登坛讲学的地方,狄兰标对这两所名院,可见他期盼学子早成杞梓、争光乡梓之心热切。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建书院、兴文教,自然是地方乃至国家之大事、好事。旋即,时任华容县教谕黄岳嵩、训导李瑛、秀才张德安等官员士子纷纷赋诗致贺,黄岳嵩连赋四绝,寄言“胜地从今多杞梓,好培滋育趁芳晨”。连地处中原的舞阳致仕县令丁永琪也遥寄《沱江书院落成》,颂词若珠:“兰馨披紫阁,桂蕊发天香。层构凌霄起,宏规匝地翔……远接濂溪范,分标岳麓望,不乏对湖湘文化的思想起源者周敦颐深致景仰,那是一颗理学文教的种子。

书院接力不辍,道光二十六年(1846)典史陶应昌“发印簿捐钱”牵头重建书院,二十七年,时任知县徐英台出面,请岳州府知府恽光宸撰写《重修沱江书院记》。咸丰六年(1856)知县狄玉麟又复重修,乾隆五十五年(1790)知县陈宾“以罚锾置田”再以田租资教。嘉庆十七年(1812)知县宗需捐“膏火田”助学,及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知县刘朝焜将书院迁至黄湖山南麓。此时的书院形制扩大,有门楼、前厅、正厅、讲堂、厢房,形成一个四合院,其设施不断配套、功能齐备,诸如寝室、厨房、厕所、浴室、水井等一应俱全。

回望当年书声琅琅

沱江书院虽为县级书院,然问世后便胸怀不志,见贤思齐。书院迁建黄湖山限后,山长即派人前往长沙岳麓书院,将岳麓书院院训“整齐严肃”四字拓回,然后用花岗岩复制摹刻分列于四块石碑,立于院内,借此作为沱江书院院训。“整齐严肃”,四个擘窠大字分别勒石,一一独立,字形显明,犹武士出列,端庄雄浑,气宇轩昂,据悉系乾隆二十三年(1758)岳麓书院山长欧阳正焕亲题书写。后来,这四个大字又被嵌入重修后的沱江书院面墙之上,人们探访,便似有礼宾仪男迎面而来,有一种庄重迎宾的仪式感,细看而又“岿然不动”,仿佛又有一种初心可怀的诉说。

有明一代,天顺年间华容出了个状元,这是华容乃至岳阳读书人的“天花板”——开科取士自隋大业元年(605)发轫,到明天顺元年(1457)长达852年间,岳州才诞生黎淳这么一个“唯一”的状元。

前面说到沱江书院的前身即龙峰书院,时在明朝,迄今600年,已无

迹可求。可它是“黎淳刘大夏读书处”——光绪壬午年《华容县志》仅此一语,便把华容人的自豪载入青史。

黎淳(1423—1492)字太朴,号朴庵,一生刚正为官,严谨治家,历史上以信臣循吏著称。满腹才华,曾是明宪宗、孝宗皇帝父子的老师,官至礼部侍郎,南京工部尚书、礼部尚书,其锋芒之下有李东阳、刘大夏、杨一清等茶陵诗派诗人,且皆为大明王朝肱股重臣。李刘杨三人深得黎淳亲炙,特别是李东阳、杨一清都是在童卯之年由黎淳耳提面命。

刘大夏(1436—1516)字时雍,号东山,明天顺八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在改革军事、平息土官造反、督治黄河水患、清理宣化府兵饷、藏匿军事档案反对再征安南、谏阻出兵蒙古、裁抑权幸等多方面卓有建树,是“弘治中兴”时期重大功臣之一。刘大夏与黎淳是真同乡,家山相距仅数里,故刘大夏少年时得以师从黎淳。龙峰书院有幸,黎淳与刘大夏都在这里启蒙,而黎淳于此更是为生为师。

育局局长兼县立中学校长。张耀寰铁肩大义,穷家兴学,出卖自家良田50亩,捐献稻谷800余石。1958年,县立中学正式命名为“湖南省华容县第一中学”,沿用至今。

1926年,著名学人赴法国勤工俭学者罗喜闻学成归来出任华容县教育局局长,在何长工的支持下,拆去县城城墙,以城墙砖扩建学校,学校规模进一步扩大,改名为华容县立第一高等小学。1946年,成立华容县立初级中学,毕业于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时任岳郡联立中学、师范两校校长的张耀寰辞职归里,出任县教

育局局长兼县立中学校长。张耀寰铁肩大义,穷家兴学,出卖自家良田50亩,捐献稻谷800余石。1958年,县立中学正式命名为“湖南省华容县第一中学”,沿用至今。

沱江书院信受湖湘文化之影响,尤其是“经世致用”“百折不挠”“敢为人先”等理念的植入,以致华容读书人志存高远,一批具有家国情怀的志士仁人成为国桢,华容彰显地灵人杰,有无产阶级革命家何长工,革命先烈蔡协民,以及朱绍清、张树芝、方之中三位开国将军横空出世。

1926年,著名学人赴法国勤工俭学者罗喜闻学成归来出任华容县教育局局长,在何长工的支持下,拆去县城城墙,以城墙砖扩建学校,学校规模进一步扩大,改名为华容县立第一高等小学。1946年,成立华容县立初级中学,毕业于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时任岳郡联立中学、师范两校校长的张耀寰辞职归里,出任县教

育局局长兼县立中学校长。张耀寰铁肩大义,穷家兴学,出卖自家良田50亩,捐献稻谷800余石。1958年,县立中学正式命名为“湖南省华容县第一中学”,沿用至今。

1941年1月,援华防疫队结束了使命。2月,国民政府卫生署立即聘请伯力士为防疫专员。从此,伯力士辗转于各个战区,防御敌人各种各样的细菌战。

常德地处湘川公路的枢纽,是华中战场直通陪都重庆的必经之道。又富产粮棉,源源不绝供应后方。日本细菌战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威胁,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先后调集20多支防疫队,一共200多人驰援常德,占全国防疫队伍的六分之一还多。

1941年12月20日,伯力士到达常德指导防疫。他首先判断常德的鼠疫流行,是日军细菌战造成的。他在报告中分析和论证道:

“……如果为了进行辩论,否定常德最近流行的鼠疫是由敌人行为引起的假设,那么,我们在说明此次流行的起因时将会感到困惑。关于这一点应该考虑下列问题:

1. 近年来,在此次之前,湖南没有流行鼠疫的记录。自1937年末以来,这一地区开展了彻底的防疫活动,不存在导致鼠疫发生的任何依据。

2. 能够设想感染鼠疫的最近地点是浙江省东部和江西省南部,从其中的任何一地到达常德最少需要10天。因此无论从哪里来,在到达常德之前都将会发病。这样外出的人反复换乘交通工具,途中还要在各种旅店住宿。他们至少在旅途中的某一时期必将使用他们自己的卧具。他们似乎不可能和跳蚤一同,或在其影响下移动。

3. 常德和浙江或江西处于完全不同的河川交通路线的地点,所以不存在感染的老鼠或跳蚤有可能随着船只移动的直接交通问题。

4. 常德地区生产大米和棉花,所以认为感染的老鼠和跳蚤是随着上述商品从其它地区运进的想法是不合道理的。

根据我们在浙江和江西的观察,最近确认,腺鼠疫在中国的流行,尽管不是全部,但其中大半在流行之前都曾出现过极其明显的当地老鼠死亡的现象,而在常德却未发现老鼠减少。我们无论如何也没有获得当地老鼠感染鼠疫的确凿证据。

根据上述所有观察和考察,对于最近常德的鼠疫流行(1941年)11月4日飞机进攻的关联,几

乎已无怀疑的余地。”

62年后,2003年,当我拍摄纪录片《常德细菌战》的时候,伯力士的中国同事依然对此记忆犹新,非常钦佩伯力士的学术威望和严谨态度。

时任湖南省巡回卫生工作队队长刘禄德回忆:“我非常佩服他。我向他报告死亡的病人,他一定要把死亡的病人的肝脏做三次涂片,找到了鼠疫杆菌,他才承认(死因)。”

时任贵阳医学院实习生王诗恒说:“我们作为他的学生,也跟他一起求证怎么检查跳蚤,这都是学术方面的事情,没什么别的目的。”

当时,正在研究淋巴腺鼠疫的伯力士收到了重庆发送的一瓶白色药丸。国民政府要求他们用这些药丸以预防鼠疫。伯力士对此感到很厌恶:“简直是胡说!他们难道想让我们靠这些阿司匹林来对付鼠疫吗?”

但他还是试用了这些药丸——它们是新研发出的磺胺类药剂中的一种,这是当时第一种被发现能有效预防鼠疫的药物。三天后,他发电报给重庆,要求他们“能送来多少就送多少”。两周内,美国红十字会就给重庆空运了两箱。这两箱药品又花了四个多星期被运到湖南。“于是我们就能真正地开始工作了。”

伯力士救死扶伤,当地人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亲切地喊他“伯医生”。常德被救治的患者,难忘这位伯医生。

1937年生的龚文耀,时居常德县周士乡新时堰村。1998年,他在陈书中写道:“一名叫伯力士的外国医生,给我检查、打针,还吃药丸子,我的病就好了。我能幸存,这要感激伯力士医生,是他把我从死亡线上救活的。救命之恩,我永世难忘。”

陈国建,时居常德县周士乡瓦屋垱下陈家。1998年,他回忆:“防疫队外国医生伯力士立即从我颈部抽血化验。他用英语沉重地说:‘幸亏来得及时,不然就没救了。’我住了五天医院方才脱险。我的生命是伯力士医生的,我要感谢伯力士医生再生之恩。”

由于长达五年之久杳无音信,伯力士的妻子甚至以为他已经死了。直到抗战胜利后,伯力士才回上海与家人团聚。

抗战胜利后,伯力士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1949年,他被世界卫生组织聘为防疫顾问,从此离开了中国。他奔波于印度等地,救治了成千上万的鼠疫和霍乱病人。

1959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表了声明:如今,鼠疫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居环境中已被完全根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伯力士医生的故事也就是关于这次伟大胜利的故事。

伯力士后来去了美国,在旧金山乔治·威廉姆斯·胡珀基金会担任研究学者。他的生活并未归于平静,鉴于他在防治鼠疫和霍乱的权威地位,以及防御日军细菌战的丰富经验,美军把他请进了迪特里克堡生化武器基地。

现在,到了AI时代。重新启动纪录片《伯力士医生》项目,是否能迎来新的转机?

(作者系纪录片《常德细菌战》导演)

二

沱江书院虽为县级书院,然问世后便胸怀不志,见贤思齐。书院迁建黄湖山限后,山长即派人前往长沙岳麓书院,将岳麓书院院训“整齐严肃”四字拓回,然后用花岗岩复制摹刻分列于四块石碑,立于院内,借此作为沱江书院院训。“整齐严肃”,四个擘窠大字分别勒石,一一独立,字形显明,犹武士出列,端庄雄浑,气宇轩昂,据悉系乾隆二十三年(1758)岳麓书院山长欧阳正焕亲题书写。后来,这四个大字又被嵌入重修后的沱江书院面墙之上,人们探访,便似有礼宾仪男迎面而来,有一种庄重迎宾的仪式感,细看而又“岿然不动”,仿佛又有一种初心可怀的诉说。

黎淳(1423—1492)字太朴,号朴庵,一生刚正为官,严谨治家,历史上以信臣循吏著称。满腹才华,曾是明宪宗、孝宗皇帝父子的老师,官至礼部侍郎,南京工部尚书、礼部尚书,其锋芒之下有李东阳、刘大夏、杨一清等茶陵诗派诗人,且皆为大明王朝肱股重臣。李刘杨三人深得黎淳亲炙,特别是李东阳、杨一清都是在童卯之年由黎淳耳提面命。

伍连德博士在回忆录中写出伯力士来哈尔滨之前的狼狈经历:

他先后被俄军和日军俘虏。之后,来到我们在哈尔滨的这所医院求职,当时他穷困潦倒,身边也没有朋友,我们刚好需要这么一位有能力且可靠的同事,于是就愉快地接纳了他,并让他负责掌管我们的实验室。

伯力士的确是一个人才,不光是位训练有素的病理学家,还是一位语言学家(通晓英语、俄语和法语)。他工作相当尽责,主动完成分配给他的任务。因此,陈永汉博士和我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中,都对他非常照顾。他不幸患上抑郁症时,有一次曾经试图自杀。我们及时挽救了他。后来,又帮他找了一位来自波兰难民家庭的妻子,还给他加薪,介绍他认识更多的朋友。这样,他的生活出现了极大的改观。衣着方面,他变得一丝不苟;与人接触时,他也变得开朗起来。而他应对艰苦工作的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从此,伯力士把人生最辉煌的30年奉献给了中国。从东北到上海,从浙江到湖南,从滇缅公路

到福建,他的足迹遍布中国,并且总是与最危险的鼠疫和霍乱联系在一起。

1930年,伍连德博士创办全国海港检疫处,帮助中国收回了海港检疫权。伯力士医生随之到了上海,协助伍连德博士工作。1932年,日军占领的中国东北再度爆发霍乱疫情。伯力士一直留在那里与霍乱作斗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占领了上海,伍连德博士避走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回乡养老。接替伍连德博士的防疫权威,就是伯力士。

他参加了国际联盟援华防疫队。上海的难民

容纳了约10万人,伯力士被要求组建一个医疗及防疫机构来为难民服务。他再度以其惯有的热情投入到了这项工作中。这个医疗机构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尽管霍乱在上海已经出现,但这些难民却极少受到感染。

三

育局局长兼县立中学校长。张耀寰铁肩大义,穷家兴学,出卖自家良田50亩,捐献稻谷800余石。1958年,县立中学正式命名为“湖南省华容县第一中学”,沿用至今。

沱江书院信受湖湘文化之影响,尤其是“经世致用”“百折不挠”“敢为人先”等理念的植入,以致华容读书人志存高远,一批具有家国情怀的志士仁人成为国桢,华容彰显地灵人杰,有无产阶级革命家何长工,革命先烈蔡协民,以及朱绍清、张树芝、方之中三位开国将军横空出世。

育局局长兼县立中学校长。张耀寰铁肩大义,穷家兴学,出卖自家良田50亩,捐献稻谷800余石。1958年,县立中学正式命名为“湖南省华容县第一中学”,沿用至今。

1941年1月,援华防疫队结束了使命。2月,国民政府卫生署立即聘请伯力士为防疫专员。从此,伯力士辗转于各个战区,防御敌人各种各样的细菌战。

常德地处湘川公路的枢纽,是华中战场直通陪都重庆的必经之道。又富产粮棉,源源不绝供应后方。日本细菌战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威胁,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先后调集20多支防疫队,一共200多人驰援常德,占全国防疫队伍的六分之一还多。

1941年12月20日,伯力士到达常德指导防疫。他首先判断常德的鼠疫流行,是日军细菌战造成的。他在报告中分析和论证道:

“……如果为了进行辩论,否定常德最近流行的鼠疫是由敌人行为引起的假设,那么,我们在说明此次流行的起因时将会感到困惑。关于这一点应该考虑下列问题:

1. 近年来,在此次之前,湖南没有流行鼠疫的记录。自1937年末以来,这一地区开展了彻底的防疫活动,不存在导致鼠疫发生的任何依据。

2. 能够设想感染鼠疫的最近地点是浙江省东部和江西省南部,从其中的任何一地到达常德最少需要10天。因此无论从哪里来,在到达常德之前都将会发病。这样外出的人反复换乘交通工具,途中还要在各种旅店住宿。他们至少在旅途中的某一时期必将使用他们自己的卧具。他们似乎不可能和跳蚤一同,或在其影响下移动。

3. 常德和浙江或江西处于完全不同的河川交通路线的地点,所以不存在感染的老鼠或跳蚤有可能随着船只移动的直接交通问题。

4. 常德地区生产大米和棉花,所以认为感染的老鼠和跳蚤是随着上述商品从其它地区运进的想法是不合道理的。

根据我们在浙江和江西的观察,最近确认,腺鼠疫在中国的流行,尽管不是全部,但其中大半在流行之前都曾出现过极其明显的当地老鼠死亡的现象,而在常德却未发现老鼠减少。我们无论如何也没有获得当地老鼠感染鼠疫的确凿证据。

根据上述所有观察和考察,对于最近常德的鼠疫流行(1941年)11月4日飞机进攻的关联,几